

胡耀邦传

●〔美〕杰斯·布莱恩●

国防大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翠　云
封面摄影：董建民



ISBN 7—5626—0186—0/D·61
定　价：　　2.10 元

胡耀邦传

[美]杰斯·布莱恩著
潘叔平译

国防大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翠　云
责任编辑：李　路

胡耀邦传
[美]杰斯·布莱恩著
潘叔平译
*　　*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
787×1092　1/32　3.5印张
1989年3月北京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2.10元

编者前言

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杰斯·布莱恩潜心创作的《胡耀邦传》，首次以长篇形式系统介绍了胡耀邦同志光辉战斗经历，在美出版后甚为抢手。

传记生动描写了胡耀邦同志的经历，他的出身，他的传奇式的少年时代，他中年的寂寞真挚和晚年的奋发与困惑；介绍了胡耀邦同志如何从一个“红小鬼”成长为毛泽东的通迅员、共青团的领导人，如何帮助邓小平与“凡是派”论争并当选为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同时还向读者介绍了大量鲜为人知的背景材料。传记作品文笔生动简洁，描述真实有趣，对了解胡耀邦同志生平、思想极有参考价值。

作者的话

一九八一年，胡耀邦开始受到外界的注视，是因为该年六月，中共中央通过选举罢黜了华国锋，而改由胡耀邦出任党主席。

在前，海外关注中国政局的印象认为胡耀邦似乎只是邓小平的“马前卒”、“传声筒”。但到八一年六月，胡耀邦已突出到台前。他的“共青团”系统的干部也逐步进入中共的“中央办公厅”。如众周知，中共掌权者的心态往往与它的政治风向息息相关。胡耀邦既然已从组织部长而政治局常委而出任党主席，他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大陆的政局必然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许多人已注意到，在最近二年来，胡耀邦对外发言的次数也大为增加。

由而，胡耀邦的出身、背景、及办事作风都有加以研究分析的必要。

也因为此，笔者着手汇集有关胡耀邦的资料。

一九八一年十月，《胡耀邦传》的初稿陆续在报章上发表，初稿刊完后，笔者觉得资料还不充分，对胡耀邦此人的素描还不够明确。

正好在这时，作者遇到一位马来西亚华侨，他与胡耀邦相识已久，为笔者增添了一些写作材料。

嗣后，一九八二年初，笔者与一知情人晤面，经他证实，中共中央的人事权如今大部分掌握在胡耀邦的手中。

一般猜测，邓之后，继承人非赵紫阳即是胡耀邦，而以胡耀邦呼声最高。今后，仍会是如此吗？邓小平今年已八十三岁，一旦有变，他的继承人会将是胡耀邦吗？如胡耀邦成为继承人，他仍会遵照邓小平的既定政策办事吗？或另创他自己的路线？寻找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如何，胡耀邦今后的动向是值得注意的。

它关系着庞大中国的未来，进而也关系着整个世界的未来。

突出在荧光灯下

的胡耀邦（代序）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六中全会”。会后，在七月一日的庆祝会上，一个身高不足五尺的矮小个子，站在讲台上，一边频频挥舞着手臂，激动时几乎整个人跳起来，就这样演讲了整整两个小时。这个面对上万听众的演说者，就是北京政坛的新秀，邓小平的继承人，从“红小鬼”，而毛泽东的通讯员，而跃升为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湖南浏阳人胡耀邦。

这是胡耀邦被正式宣布为中共党主席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香港的左派杂志报道现场听众对他的印象是:“太激动”,“跟我们想象中的领袖形象有点差别”。

胡耀邦的演说虽然被评价得不高，在中国共产党政权中，这并不会影响到他的权力与地位，他仍是邓小平内定的继承人之一。

邓小平以一个“四川经验”起用赵紫阳，再以一个“庚申改革”起用胡耀邦，这两个都是他“三中全会”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比较起来，胡耀邦的私生活较为严谨，直至今日，还未住入中南海，甚至在“四人帮”当权时期也没有出现大量丑化他的文字。从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看，这两个“政坛新秀”在军队中的资历都不高。

出身是"红小鬼"

胡耀邦，一九一三年出生于湖南浏阳乡间。浏阳位于湘北,在长沙市之东,盛产菊花雕石,民风强悍。

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中的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随后宁汉分裂,“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命令中共实行没收两湖地主土地，武装工农红军，夺取国民党权力。九月，毛泽东在湘鄂两省搞“两湖秋收起义”，带领农民斗争地主，对其实行镇压清算。胡耀邦时年仅十四岁，因出身贫寒，亦随同一批无依无靠的青少年参加红军的“儿童团”，俗称“红小鬼队”，整日价跟在人群后面斗地主，分田地。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自然不懂得什么马克思。只是凭借着他短暂的生活经验和朴素的感情，跟着大人们干。

十月，国民政府军队收复浏阳地区，毛泽东撤往江西井冈山，部分红小鬼亦随暴动者撤出浏阳，日伏夜行，登上井冈。

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黄克诚、宋任穷、谭启龙等又在湖南平江发起暴动，会合毛泽东在湘赣各地群起而动，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十二月，井冈

山被国民党军队攻破，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率领红军部队转移赣南，胡耀邦亦在其中，时年十五岁。

至于胡耀邦更早年的身世并未见有详细的资料[①]，亦可能因为他是战火孤儿，所以，他父母的姓名及阶级出身均未见于记载，香港的一些报道在介绍胡耀邦的童年生活时说：

“胡耀邦，湖南省浏阳人。国共十年内战期间，他参加苏区的儿童团，俗称‘红小鬼’，斗争地主老财非常坚决和能干，又富于组织及宣传的能力，遂得以崭露头角，逐渐晋身为苏区儿童团的最高领导成员。

苏区的儿童团，是个富于斗争性的战斗组织，平日儿童团员们十分活跃，在村子里侦伺地主、富农和其他阶级异己分子的活动，又在村口及交通要道上安岗放哨，检查来往路人的路条，遇有可疑对象，立即鸣号示警，招致众人前来应付。一旦战火波及邻近区

① 中共有个习惯，就是对它领导人的早年生活及家庭关系，一向保持机密，而且除非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许可，不得公开发表。胡耀邦在十四岁前的遭遇如何？恐怕仍有一段时候未能为外界所知。一九八四年元月，香港《明报》发表了一位名为刘绍熙的上海市工人的自述说，胡耀邦是他在浏阳文家市里仁高级小学的同班同学，是寄读生，只读到高二（等于小学五年级）。另据现在台北的陈绥民教授回忆，胡耀邦后来在离浏阳数十里路的一间中学读过一、二年书。

域，儿童团员担负支援前线的运输任务，出没于战火纷飞的前沿地带，或者巡逻放哨，时刻侦察敌情。敌情紧急之时，儿童团员甚至直接承担战斗任务。

从十五岁到十九岁这段期间，胡耀邦正是一个在成长中的青少年，记忆力强，善于模仿学习，当一般城市同年龄的青少年还忙于发型、穿着和写情书的时候，他却在那种环境中学会了如何和敌人斗争，而且表现得非常坚定。不久，这个瘦小机灵的矮个子竟也能“独当一面”了。

来自中共方面的报道是这样地描述他：

在抗日战争前的鄂豫皖苦战时期，胡耀邦对于国民政府基层中的某些游移分子，譬如一些并非死心塌地与中共作对头的乡长、保长们，利用他们爱惜身家性命的心理状态，协之以威，动之以情，争取他们在国共斗争中持有中立的立场，使之不足为患于中共在该地区的活动。同时，对于那些决心与中共为敌保权势保家财到底的死硬派，集中力量对付之，一俟有机会，即狠狠予以镇压。胡耀邦通过上述双管齐下的方针，特别是在国、共势力犬牙交错，共产党游击队活动频繁的地区，确实可以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并且能够进而改变那些乡、保长们的立场，使之成为名副其

实的“白皮红心”的特殊角色。

事实上，当时在胡耀邦分管领导下的某些地区，这方面的工作确曾取得很大的成绩。胡耀邦派游击队深夜潜入村庄，千方百计地将那些拒不听命的乡、保长们，一一予以铲除，并且贴上布告，说这样就是为虎作伥、冥顽不仕者的下场，这一招杀一警百，以儆效尤，果然有效，在胡耀邦提倡彼此默契、共策互利的政治感召下，有些乡、保长纷纷有意靠拢，经过联系之后，陆续改变立场，表面上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周旋、敷衍，暗底里却与共产常互通声气，搞些暗送情报，采办药品之类的事，客观上确实对中共有所助益。

胡的工作方法是，先给那些乡、保长们一点甜头尝尝，使他们为共产党做些惠而不费的小事，一旦他们入港，以后就不怕他们复萌反心，如果有谁想半途退出，自然就会有人向国民党军队密报，说那人先前“通匪有据”，罪证确凿，国民党自然也就不会饶过他，这一招往往有效。此后那些持中立态度的乡、保长们，便感到势如骑虎，进退两难，只得死心地为共产党效命。

一九三三年，胡耀邦因表现积极，被选派在毛泽

东身边工作，做了毛的通讯员。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苏区由于路线错误致使无力击破国军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战事频频失利，情况危殆，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突围，分别从江西的瑞金和福建的长汀两地出发。

出发前夕，周恩来提议，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红军的兵额，另外成立一个“少共国际师”，凡系苏区十三、四岁以上的男孩，都可以入伍，这个“少共国际师”的中坚干部，大抵只有二十岁年纪，包括前后任师长刘亚楼、曹里怀、彭绍辉，师政委萧华，政治部主任冯文彬。[①]

起初胡耀邦亦在这个师担任团的总支书记，不久被调入红军总部任干事。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胡耀邦出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时年廿一岁。

---

① 官方的记载是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彭德怀已组织“工人师”与“少共国际师”。另据陈绥民教授说，中共长征途中，胡耀邦在“少共国际师”中是在蔡考乾的直属指挥之下。到延安后，在“抗大”第二期受训。

从毛的“通讯员”到“团书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生北京卢沟桥事变，中国正式宣布全面对日抗战。西安事变后，共产党部队接受收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得以在内战稍息中投入抗战。后不久，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由山西的阎锡山指挥。

这段期间，胡耀邦曾担任过共产党在延安所办的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江青在这个学校上过课。

一九四O年，胡耀邦奉党的命令从陕北潜往山西做工作。

一九四一年，胡耀邦二十八岁，从地下转到地面，任十八集团军的一个政委。那时邓小平是中共"太行山区"的军区政委，是他的直属上司，胡耀邦和邓小平共事了八年。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内战烽火四起。邓小平是中共"第二野战军"第二号人物，由华东进入西南。胡耀邦一直追随在邓部队中。

一九四九年，胡任"中央二野第三兵团政治部主任"及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

该年，中共部队久攻山西太原不下，毛泽东召集动员所有的中共部队“精英”前往协助。胡耀邦因曾在太行山区呆过，对该地区的情况熟悉，也被毛泽东召唤到太原城郊参与激烈的攻城战。[①]

中共的内部报道说：

在一九四九年太原攻城时期：当时，围城部队系“华北野战军”的“第十八兵团”和“一野”的“第七军”，兵力不为不庞大。“十八兵团”由徐向前亲自指挥，领导成员有李井泉、周士第和胡耀邦等人。然而，围城军竭力攻战，却难越雷池。有一度彭德怀和罗瑞卿亲临城下督战，仍然收效甚微，彭德怀自从延安整风中受到严厉批评之后，毛泽东即将之投闲置散，未予重用，尔后彭从事延安保卫战立下汗马功勋，被毛泽东称为“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次“军委”派他赴太原督战足证太原战役进行的艰苦。攻城战事中，胡耀邦等人在组织政治鼓动工作之外，派出大队人员四处寻觅守军家属，或者阵前劝降，或者书写劝

---

① 太原为山西重镇，军事上的战略要地。中正书局出版的《简明中国现代史》说：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共军以六十万人猛攻太原，因与守军逐屋巷战，共损失二十万人以上。国民党省政府代主席梁敦原自戕。

降信件，千方百计地动摇守军的意志。[①]

解放军还在守城工事外沿地带，广泛进行阵前喊话，将从俘虏士兵谈话内容和内线情报得到的资料，通过喇叭广播出去，譬如说："王××听着，某日你作了某件恶事，人民给你记了账，你应该立即停止作恶，否则城破后严厉惩罚。"

过一会，广播又说："李××听着，某日你作了某件好事，人民给你记了账，城破后你可以立功受奖。"如此这般，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搞得守军人心惶惶，疑神疑鬼。这一怪招，对于瓦解守军的意志，起着极大的作用。当时胡耀邦任职"第三兵团政治部主任"，具体负责攻城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上述各项工作，即是属于胡耀邦的分管范围。

太原攻城战结束后，胡耀邦随着"二野"部队进入西南地区，他的工作就是在川北地区进行"镇反"和"土改"。

如所周知，中共雷厉风行地搞镇反和土改运动

---

①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出版的大陆"文摘报"称：太原攻城战的功臣彭德怀因不满"大跃进"政策，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毒打后半身瘫痪"，彭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廿九日在北京去世。

时，比较突出的省份是四川省和广东省。广东省的运动，起初由方方、冯白驹、古大存等地方主义派领导，后被毛泽东否定，改由陶铸、赵紫阳负责其事，陶、赵两人一面打击地方主义势力，一面将错误的土改运动推倒重来，双管齐下，终于顺着中央和人民的意图，完成这两项运动。至于四川省，由于长期作为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地带，情况特别复杂。素以“辣手造乾坤”著称的邓小平来川坐镇。邓氏创造了“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八字方针，将四川的镇反和土改运动搞得如火似荼。这个八字方针极合毛泽东的心意，后由中央明令，向全国推广，凡系被认为运动搞得不彻底的地区，只要条件许可，便要照此方针进行“补课”。

川北“镇反时期”，也即共产党建国之初，川北、川南、川东、川西四个行政公署，就分别由胡耀邦、李大章、阎红彦和李井泉担任最高领导职务。

胡耀邦因在川北表现杰出，被毛泽东于一九五二年调到中央，任中央“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央书记。另一个原因是，邓小平也于同年八月被从四川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

该年胡耀邦是三十九岁。

“安徽报告”

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五年这段期间，胡耀邦一直在北京做他的团中央书记，兼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没有什么变动。

胡在北京的生活中有时也会陪邓小平打桥牌。

根据"文革"时期"红卫兵"所掌握的资料指出，胡是邓打桥牌时的伙伴，他们玩牌的经常地点是北京养蜂夹道的一座豪华俱乐部。

一九五六年，胡在中共"八大"中被选上"中央委员"，时年四十三岁。

一九六一年，中国大陆因搞"三面红旗"运动，搞出大祸来。

缘因实行"人民公社"的结果，老百姓以为从此可以吃"大锅饭"了，国家也不再允许从事个体生产，因而生产意愿大大降低。加上天天搞"大炼钢"，疏忽了适时农耕，收成大减。开始时吃公粮以补不足，后来吃"战备粮"，最后将"种粮"也吃光了。这就发生了连续三年的人为大饥荒。

饥荒期间，各省都出现吃树皮草根，甚止吃"观音土"的情形。三年中最低估计是饿死了上千万人。

毛泽东因久处深宫，耳边只听见下面说好话，起初还不相信真相。后来饿民四处流窜逃亡，各地交通大乱，尤其是广东省出现举世闻名的“五月逃亡潮”，大量饿民涌向香港边界，漫山遍野哀鸿苦告，这才知道事态严重，于是派出“工作组”到各省访查。[1]

胡耀邦于是年被派往安徽，视察后据实写了一个报告，承认安徽一地饿死了三百万人，这是有名的“安徽报告”，是胡耀邦数十年来为中国人民所做的大好事之一。

在北京这十三年间，是胡耀邦一生中家居生活比较清闲的日子。他已结了婚，妻子本名黄美华，是在山西工作那段时间结合的。

黄美华，山西省左云县人，一九一六年生，是早年共产党派在日本占领区的地下工作人员，受过特种训练。她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嫁给胡耀邦，翌年生子

---

① 这次饥荒是中国大陆人民所永远记忆在心的悲惨经验。一位曾在东北生活过的人说，城市人民严格执行配给，每人每月只有四两油，食米二、三十斤，鸡蛋是过年才有的。农村地区最惨，有高粱杆子做的窝窝头吃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小米稀饭算是盛宴。那段时间，连北京附近的唐山大沽口都饿死大批大批的人。在南方，饥饿的广州市郊人民吃的是香蕉树、木瓜树的心、米糠、黄狗头（蕨类）、香蕉头包、和西施粉（水苔）等。

胡卫国，四六年生次子胡清华。（黄美华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以李昭的名字到香港观光，住在商人邱德根的家中，并曾参观了专售意大利货品的瑞兴公司。）

在生活习惯方面，胡耀邦不喜欢喝酒，但有抽烟习惯，烟瘾很大，而且独好英国出品的三五牌。平日进食喜吃腊肉干及炸臭豆腐。

“陕西王”变成阶下囚

一九六五年三月，邓小平出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党是总书记，胡耀邦得以被放到陕西任省委第一书记。

可是，好景不常，这个"陕西王"的位子屁股尚未坐热就碰到"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一九六六年，邓小平作了公开检讨，该年底，被下放至江西"五七干校"，在食堂做杂工。

胡耀邦也必然撑不下去。

一九六七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疯狂阶段，"一月风暴"中，由毛泽东授意，江青执行，发动红卫兵冲击省市一级党政机构。胡耀邦在陕西也被揪斗。①

据后来的报道说，胡在斗争大会中表现得很倔强，先是戴高帽、挂纸牌，但胡不认罪，后来挂上木牌，还不认错，最后更换了一个更沉重的木牌。

所谓的高帽，是铁丝作圈，外面糊以硬纸，有五斤重的，有十斤重的；所谓的木牌，是一块木板，上面写有姓名和指控罪名，用铁丝穿着挂在脖子上，时间一久，就勒到肉里去，能使人痛苦不堪。

中共在早年的镇反和土曾经使用这种方法斗争地

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可是三十年风水轮流转，想不到“建国”还未三十年，这种酷刑就轮到自己的同志的头上来了。[①]

一九六七年夏天，胡被下放至河南农村的“五七干校”（牛棚）接受两年半的再教育。该年胡是五十四岁。

“牛棚”是下放接受劳动教育干部居所的通称。有些是指在一般农家的牛棚里放一块木板作为床，有些是指在荒野或河边用芦苇搭成的茅蓬。下放期间接受再教育者多数时间是在农地里劳动，每日在监视者督

---

① 从一九七三年到七五年在中国大陆住了三年的法国著名作家嘉克·布洛叶雷与他的太太克拉迪·布洛叶雷，合作写了一本书，强调“毛泽东晚期的遗产可用几个字总括：饥饿、恐怖、控制青年、无能摆脱低度开发困境”。

这本叫做《毛泽东启示录》的书，由巴黎最大印刷公司印行，法国书评家视它为一本“以（中共政权）正式文件”，党的报纸以及无可反驳的证词为基础的佳作。

书中指出，十年的“文革”生产亿万名牺牲者。（中共）党方已承认有一亿人遭迫害。他们或在武斗中受伤而成为终生残废，或被关进黑牢及送入劳改队，或被逐出其“住宅”，被革去工作，沦为乞丐或被“下乡改造”。他们全部被逐出社会打入“黑湖”。布洛叶雷夫妇在书中说，至于有多少万人死亡，（中共）党方仍无法透露这个数字。但有无数教师、知识分子、“富农”、“嫌疑犯”、“坏分子”被红卫兵私刑致死，许多红卫兵后来又被其他红卫兵相残。

导下从事生产，还要接受新“形势教育”和不断作自我检讨。

受到“四人帮”如此的羞辱，胡耀邦当然恨透恨透，从此就与江青那一伙势不两立。

从牛棚出来后，他无事可干，闲散在家有四年多。

苦斗“四人帮”

一九七五年，林彪集团受到整肃后，毛泽东四顾无人，又起用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邓小平借机起用一批老干部，胡耀邦也是其中之一，他被安排在“科学院”任“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当时，邓小平号召全国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在他主持下，迅速制定了三个重要文件，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汇报提纲”系胡耀邦负责拟订的。其他二个文件则由胡乔木草拟。

邓小平把路线斗争成败全心寄托在这三个文件上(中国共产党内部一向重视政策性文件，谁的文件被发表在“二报一刊”上及被发下去给各级干部学习，谁就被视为是中央政策的决策者。）因为邓对这三个文件的效果感到满意，就整日价和胡耀邦、胡乔木伙在一起密商如何扩大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并为自己翻案。这个情形当然逃不过“四人帮”的注意，当时就有“拉二胡复周礼”的说法，就是指邓小平拉拢胡耀邦和

胡乔木支持周恩来排斥“四人帮”。①

江青“四人帮”到毛泽东面前告密的结果，毛泽东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下决心掀起全面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再度搞臭邓小平。

邓小平一看情况不对，去往广东从化，受叶剑英、许世友的保护。胡耀邦仍留在北京，他被“四人帮”指为是邓小平一伙，“汇报提纲”也被江青等攻击为“大毒草”。

“四人帮”手下贴出的黑材料大字报说邓、胡除了在工作上火热勾搭外，在私生活方面也难舍难分。邓小平的妻子蒲琼英（卓琳）和邓结识就是胡介绍的(他们于一九四〇年结婚。)

大字报并说，胡是邓扩张权力的首号急先锋，为邓四处奔走。

---

① 孔仲文先生在他所发表的：“毛泽东执政二十七年”一文中说：“文革”最终目的是打倒周恩来。他分析说：毛无法在党中央及政治局取得支持者，只有采取史无前例“自下而上”的办法。他指出：毛在一九七三年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矛头就是针对周恩来。他并指出，在周死后，毛不向遗体告别，不参加追悼会。

帮助邓小平复出

一九七六年，胡耀邦做了一件事，使他与“四人帮”之间造成尖锐的对立，那就是在“天安门事件”中的表态。

该年三月二十五日，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①，接着几天后陆续不断出现从各方面送去的花圈，但首先以单位名义出现的花圈，是三十日晨从万里主管的铁道部和胡耀邦领导的科学院送去的，紧跟着，是几个国务院直属的大单位，就是说，有些单位开始公开表态支持了，对群众来说，也就是有了“硬里子”，此后，悼念诗联及反江青的文字也渐渐出现，最后在四月五日（清明节的次日）引发了大规模流血镇压。

这时，邓小平正逃亡在广东，北京是“四人帮”的天下。胡耀邦胆敢在北京首先表态反对江青是相当需要一些勇气的。

“四人帮”因天安门事件受到毛泽东的责备，导致

① 周恩来是一月八日死的，周死前与“四人帮”明争暗斗甚烈。从一九七三年起，江青和张春桥试行组阁多次，均受到周的反对。

华国锋的被委主持日常事务。而"四人帮"的张春桥因此失去了出任"总理"的机会，"四人帮"当然是不甘心的。可是他们还未来得及报复，毛泽东却在九月间逝世，紧接着，就发生了十月六日的逮捕"四人帮"事件，这次逮捕行动实际上是由华国锋、叶剑英与李先念等人所联合发动的一场反政变。

一九七七年初，胡耀邦终于正式复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这是个相当重要而敏感的职位，因为中央办公厅主管党中央的机要和安全。胡借着这个阵地拚命在宣传理论上做功夫，帮助邓小平复出。

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在一次内部安排的妥协下恢复原职，即"党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及"国务院副总理"。条件是承认华国锋为"党主席"。

邓虽然得以复出，但仍屈居华国锋之下，这对于领导党和国家，仍是个不合适的结构，于是，在胡耀邦的协助下，不久又搞出一件大事来。这事情使中国有了新的开始。

“凡是”“实践”大战

一九七八年五月，邓小平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提法进攻。中共中央内部引起骚动。当时华国锋正在朝鲜访问，得到了消息，并不在意。

十二月召开“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安排在“工作会议”（即预备会议例称“打招呼会议”）中发动总攻，压制主张“两个凡是”理论的华派人物。华才开始警觉，找人把胡耀邦叫去，说“应该让大家把话说完”。胡阳为敷衍，暗中加紧准备。“三中全会”举行大辩论，邓派取得压倒性胜利。邓的领导地位又被确定。华国锋名为“党主席”，从此一蹶不振。

香港一些小道消息对此事的报道颇为精彩，现摘录如下：

“一九七七年夏，邓小平东山再起，重新执掌大权。这年年底，胡耀邦、胡乔木两人得到了重用，胡耀邦接替郭玉峰任中央组织部长，胡乔木则出任社会科学院院长，他们俩在不久后到来的有关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件事，先要从杨西光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说起，杨系中共为数众多的笔杆子之一，对理论问题素有研究。文革前杨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教育、宣传等工作，地位亚于张春桥，文革初红卫兵蜂拥而起，翻江倒海，把杨斗得七窍生烟。

“四人帮”垮台前，杨获复用，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之职。胡耀邦任组织部长时，恰值“光明日报”总编辑一职有空缺，胡急需引用一位有理论水平者来担任此职，以为臂助，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启用杨西光担任此职。杨复出后不久，正逢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前系政教系讲师）写了一篇文章投到“光明日报”，杨看了认为可资运用，就送给胡耀邦看，最后，胡、杨商量之下，征得邓小平的同意，于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决然地在“光明日报”上首先刊载该文。接着，“人民日报”、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报纸相继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由于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不仅仅是个学术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涉及极为敏感的政治领域，由此触发了实践派与凡是派的全面交锋。这场争论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自不待言，迄今仍能感觉到它的余波。在这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辩论中，许多中央和地方省、市一级的高干

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嗣后，《人民日报》直率透露：一九七八年的四月上旬，“他（胡福明）到北京参加哲学讨论会。《光明日报》社、中央党校的同志，当面给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最后定稿的这篇文章，既保持了作者的原意，又加强了现实的针对性”，“具有更强烈的战斗性”。它针对什么，向谁战斗这是不言而喻的，鼓励他写这篇文章的也不只是《光明日报》社，还有邓小平和胡耀邦。

实践派发动这场大辩论之前，为了先声夺人，一战即胜，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凡是派全被蒙在鼓里，一点没有察觉。据悉，《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恰正选择华国锋访问朝鲜之际，凡是派根本来不及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该文披露于世后，汪东兴、纪登奎联名致电华国锋，汇报这件事，并认为这件事牵涉甚广，后果堪忧，向华请示应付的方针，华接报后，力主慎重态度。据当时陪同华访朝的耿飙后来透露的情况，华国锋悠然处之，笑谓且由他们去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中心论点，是在否定“凡是派”所说的“凡是毛主席说的话都是真

理”。于此延伸，毛泽东亦不免有错误，既然毛泽东亦有错误，那冤、错、假就该平反。这个延伸结论抓到了绝大多数在文革期间被整的老干部和更广大人民的心理，因而群起支持，华国锋想压也压不住了。

小道消息又有如此报导——

邓、胡联手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宣传上掌握了主动之后，第二步是团结及分化华国锋左右的元老实力派。

邓小平安排在“三中全会”前先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举行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请陈云领头讲话。陈云在会上首先攻击“凡是派”的全盘肯定“毛泽东路线”的理论。

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大家对於毛主席的功与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由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我认为毛主席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起到全国解放，也就是一九四九年止，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应予全面肯定。第二阶段是从五O年新民主主义时期至五七年鸣放运动止；其间如土改、抗美援朝、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

五七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干，到六五年止；其间毛泽东在六一年起退居第二线，不大问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在他当政的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六六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最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

陈云就评毛开始发炮后，在工作会议上，凡是派与实践派斗争甚烈，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诸人还坚持自己的观点，实践派鸣鼓而攻之，搞得这些个人狼狈不堪。据后来传达报告说，“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主动找胡耀邦商量，认为会议上群情激昂，踊跃发言，应该让大家把话讲完”。从这点看来，胡耀邦可能是会议期间的主攻派头头。等到华国锋警觉才找胡耀邦去讲话，一切都已太迟了。

这次工作会议，为实践派的首领邓小平铺好了往后拨乱反正、实行改革的道路，以后的“三中全会”不过是形式上的追认而已。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认了实践派的路线和方针，决议今后全党都要遵照执行。

这次会议上，正式剥夺了凡是派的实权，由实践

派骨干们接替执掌。譬如凡是派首要份子汪东兴辖下的“八三四一”部队，便由该部队原副政委杨德中接管，汪原来主管的情报、保卫的工作，也全部移交给中共元老陈云① 接掌。

由于“三中全会”决定华落邓起，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要实行一条与以往三十年完全不同的改革道路，邓小平视此为一生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所以邓胡等教育干部常常以“三中全会路线”为纲。实际上他们所指的就是邓小平的改革路线。

邓能再居领导地位，胡耀邦在幕后穿针引线的因素很大，这一段时间，胡耀邦做了大量拨乱反正，平反冤狱的工作，解放了一大批被“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极得人心。

在这次会议中，胡耀邦被选政治局委员②，并任中央秘书长一职。（一九七九年元月正式宣布其兼任

---

① 陈云此人为五朝元老，中共诸届领导人组阁时，他都占有重要席位。也是走资派五巨头（邓胡赵彭陈）之一，一九七九年二月，在“中共中央”的“五中全会”后，华国锋彻底垮台，胡被擢为政治局常委，情报及政治保卫口的权力从陈云手中交给胡耀邦。

② 中共的政治局是最高决策机构，当选政治局委员是真正进入了权力中心。但组织部长已是一个重要的职位。

宣传部长）

中央秘书长一职，在五十年代初期，曾由邓小平担任。胡耀邦此时实际上已经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事务了。

该年胡耀邦是六十五岁了。

进入决策层

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共举行“五中全会”。华国锋因采取了错误的“极左路线”受到批评。胡耀邦升为政治局常委。

中共中央领导者掌握了“政治局”和“中委”，就可指挥“政治保卫系统”，再回过头来使用“政治保卫系统”。

有关“政治保卫系统”，这是研究中共内部权力最敏感部份，须先详加阐述。

毛泽东发动文革，靠三种力量，其一是江青、张春桥那一股“造反”力量，包括文的“宣传能手”和武的打砸抢的“造反派”；其二，是林彪的武将；其三就是康生、谢富治、汪东兴控制的“专政队伍”。如果没有“专政队伍”插手文革，文（江）武（林）两派可能不会干得那么凶。

谢富治主管公检法，即所谓“外卫”（外部的保卫），汪东兴则主持“八三四一”这一中央警卫部队，负责“内卫”（高干内部保卫）。在文革期间，谢富治可以随便以“革命”之名，捕人杀人（如杀遇罗克），汪东兴则可根据密令，随时关押高级干部，周恩来之

无法营救贺龙（元帅）、许光远（大将），就是因为“八三四一”看管。

中共中央之清算康生、谢富治，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和“八三四一”部队职务，解除纪登奎的“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目的就是要整顿公安保卫系统，铲除“私家专政队伍”，才能防止江青一派和“第三势力”的复辟。

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权建立时，中共“中央警卫团”扩充为九个团，全部驻在北京，任务是保卫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中共中央各重要机关，当时及目前北京的保卫力量，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北京卫戍区的卫戍部队，这是中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所指挥的，指挥的是正规的人民解放军，是与北京军区指挥的部队配合的，任务是北京的卫戍。第二部分称为公安部队和人民警察，任务是维持一般治安。第三部分就是“八三四一”部队，它的任务专为保卫中共中央重要机关和中共中央若干最高级领导人。这个部队是负这个专责的，一般的社会治安和卫戍工作，与这个部队无关。

“八三四一”部队保卫的地区就是天安门四周等等地区，特别是中南海，因为目前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均在新华门内。中南海，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等居住的地区，过去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等也都居住在中南海内。中南海除了原有的建筑外，具备一切最新的现代化设备的办公处所。“八三四一”部队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严密保卫这个地区，保卫的方法，除了巡逻、站岗之外，主要领导人的住处均派有警卫连、排。由于房屋的建筑安排，都符合了警卫条件，通讯联络均有现代设备，迅速正确，百无一失。

每一个中央高级领导人走出中南海，就有“八三四一”部队派员跟随保护，安全确是安全极了，如果警卫人员一旦奉命要逮捕他时，又可使他绝无反抗余地。“文革”开始夺权时，刘少奇是国家元首，汪东兴要他作检讨，他只有听命，因为刘少奇的警卫人员都是“八三四一”部队派去的，刘少奇不能自己任用自己亲信的警卫人员，连到刘少奇身边的人，包括保姆也是由“八三四一”部队派去的。

刘少奇单独一个人跑不出中南海，他的司机和警卫也是“八三四一”部队派去的。他在任何地方都受“八三四一”部队的保护，毛泽东完全控制了“八三四一”部队，也就完全控制了刘少奇。

甚至毛泽东对待江青也是如此。平时确是保卫，

但发生情况，平时的保卫就成为长期的监视。汪东兴之所以能轻易地逮捕“四人帮”，就是因为保卫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警卫连，即是由“八三四一”部队派去的，一声令下，即可逮捕，因此没有发生任何的反抗。

汪东兴之能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就是依靠这个力量。

该部队开始时，只有八千名队员，汪东兴使其膨胀为一万五千名，几乎增加一倍的人员。

“八三四一”部队是一个隐密的部队，这个隐密禁卫军是使用老式武器的解放军中出类拔萃的现代化部队。

队员们多系贫苦家庭出身，知识水准自然是普遍的低下，所以毛泽东便在队员的任务中增加了“学习”的一项。五七年一月设立了中等程度的文化学校，六O年更设立了业余补习大学（是定期制），毛泽东自任该两校校长。他这个校长绝不是只挂个空头名衔的校长，队员的作文，他一本一本地阅读、改错儿，对出差队员的携带教科书，也一一过目。

如果说党的心脏是党中央办公厅，那么和这个办公厅有表里一体关系的便是中央警卫师——就是这个

"八三四一"部队了。该部队的任务，简要说来，就是保护党的要人，管理党的重要机密，调查国内情势向党中央报告，担任党中央与地方的联络工作等等。

"八三四一"部队直接护卫的要人，有"党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滞京的中央委员"、"人民代表大会正副常务委员长"、"国务院部长级以上的官员"，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在地方方面，为了保护各地方省"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军区政治委员"，由"中共中央"派遣人员到各地方。有要人出差出国，队员也随行。文化大革命初起的六六年三月，刘少奇国家主席出访东南亚时，汪东兴就曾随同前往。而就趁着"老猫不在家"的这段期间，毛泽东便一步步地向居守北京的刘派北京市长彭真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人节节进逼。

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及其他要人居住，并且是党中央、国务院等重要机关所在地的中南海地区，其警卫是有内卫、外卫之分的。建筑物内部、周边，及中南海全体，共有两、三重，都在重叠方式警备态势之下的。北京市内江青的三处住宅；西单太平桥姚文元的住宅（高岗的旧宅）；西什库红罗厂毛家湾林彪的住宅；及住在台基厂北京市党委员会

公舍（旧日本大使馆公邸）的彭真的住宅等，每一处，都在森严警备之下。此外外宾住宿的钓鱼台，毛泽东等诸要人的别墅、保养所等，也都列在警备区域之内。所以，如果不把“八三四一”部队拉拢入伙，军事政变是绝难成功的。护卫要人的最高负责人是周恩来、做妻子的邓颖超，便也是中南海党委会书记，对警备工作，也尽了一分辅佐之力。

“八三四一”部队的中心人物是汪东兴，既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警卫师政治委员”，又兼任称为总司令官的“中央军委保卫局长”，另有一时期更做过公安部副部长，这位副部长可远比部长有实权。七五年十二月康生死后，汪东兴又兼管中央调查部，不折不扣，成为军党政全体特工的头目。他是生成的“禁卫”队员，四十余年间，他就像毛泽东的影子，毛泽东在哪儿，他必定也在哪儿。

中共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和“八三四一”部队职务，是费了很大气力的。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胡绩伟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的报告中说：

“《中国青年》出第一期，这个领导打电话给团中央，说不准发行，理由有四条：第一、没有登毛主席的诗，第二、没登华主席题词，第三、登了天安门

的诗，第四、登了韩志雄的文章。《中国青年》杂志一条条地驳了。他又狠狠地骂一顿：《中国青年》要挑起中央的矛盾。说：'这期杂志为什么不能发行，就是因为没有华主席题词'，推到华主席身上，可是这里面有叶副主席题词，所以，从他的所作所为来分析，我们可以看看究竟是谁在挑拨中央领导之间的关系。刊头画了天安门，画了花圈，他看了不高兴。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人们要坚决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就是要争取一个为总理哀悼的权力，为总理鸣不平。二是希望邓小平同志早日恢复工作，这个领导和人民的心愿完全相反。

周恩来逝世第二年，天安门前面有个花圈旁边摆了个小瓶子，这是指'小平'，'甲午风云'有个邓世昌，上演后轰动了，说'邓大人出来了'，这是对小平同志的怀念，把邓小平说成是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是个大冤案，这个领导恰恰相反，他在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十一月八日）说：'邓小平有错误，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的东西，有个四号文件是毛主席批的，还是对他以观后效。'说，'邓小平那两下子，不如华主席，试了一下不行。'他的这话，有人在天安门写大字报逐条批，说'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

行，你那两下子更不行。'我看邓副主席还有两下子，你有几下子呢？但是他们很顽固，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办公厅传达时，中办政治部一个负责同志说：'要警惕，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邓小平和'四人帮'有三个一样，一样反对毛主席，一样反对毛泽东思想，一样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毛选编办的一个负责同志说：'四人帮'是坏的，但不能说邓小平好，阻止邓小平同志出来，他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匆匆忙忙地抛出两个'凡是'（二·七社论），目的很清楚，他们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反对小平出来工作。我们编了一版诗，其中有一句，'总理的奇冤已经伸，清明的冤案何时清'，这个领导说'这句话最坏最坏'。"

胡绩伟所说的"这个领导"就是指华国锋当权时主持政治保卫系统的汪东兴。

七七年八月举行"十一大"时，汪东兴是一生中最顶峰时期，他是中共仅有的四个"副主席"之一，排名于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之后。

七八年，开始传闻"八三四一"部队参与镇压天安门事件，这也许是有计划地开始揭露汪东兴，陈锡联的"二OO一二"部队接替了"八三四一"部队的部分

任务。这时华国锋本人也因曾经以公安部长名义下令镇压天安门事件，不便出面回护汪东兴，使汪东兴越发处于下风。

七九年二月，秦基伟的“五七OO三”部队整个接受了陈锡联“二OO一二”部队以及汪东兴的“八三四一”部队的全部任务。

就这样，汪东兴被邓派用“掺沙子”、“剥笋”的方法，逐渐剥夺了兵权，变成光棍“副主席”。

而汪东兴所属的政治保卫系统也就被邓小平和胡耀邦接管了。

胡既进入权力核心，掌握了中共中央机要和政治保卫系统，但事是人来办的，他的干部队伍又在哪里呢？

胡耀邦周围的干部们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九年间，大陆上人们从轻松的顺口溜不十分准确地形容中共政治结构是“毛泽东的旗子，华国锋的牌子，叶剑英的面子，邓小平的调子，胡耀邦的班子。”目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了，有了对毛泽东的批评，华国锋已经被换下去，叶剑英也年事已高。

目前的情势似乎是中共老一辈的掌权者只剩下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接上来的是北京曾流传的“五胡乱华”的胡耀邦、胡乔木、胡克实、胡伟绩、胡启立，及赵紫阳、王任重、宋任穷、方毅、谷牧、万里、习仲勋和田纪云等。

如胡耀邦有所谓“班子”，他的“班子”只有少数进入政治局，如以年代来分，和胡耀邦先后进入不同领导层的同事为：

六十年代是：胡克实、胡启立、王伟、王昭华。七十年代是：李昌、杨西光、冯文彬、于光远。八十年代是王兆国、胡锦涛（八四年十二月任“共青团”第一书记）和郝建秀。

总的来说，胡的“班子”里面大都是理论方面的人才。行政实务方面的比较缺乏。

日本读卖新闻松永成太郎分析胡耀邦的班底时指出：

一九八O年底开始，老共青团（胡耀邦的老班底）干部不断转任地方干部。最先提及的是全国最年轻的市长——五十一岁的胡启立。他出任了天津市长。胡启立毕业于北京大学机械系。文革前，担任“团中央”的候补书记。文革期间，被指为“胡耀邦一伙”而失势，同胡耀邦有十分深厚的关系。“四人邦”被粉碎后，他重新出任“共青团书记”，并开始参予中共中央的活动，甚得胡耀邦信赖，其年轻更是最大的期望。

此外，一九八O年，出任“青海省党委第一书记”的梁步庭；八四年初，出任福建省“党委常务书记”的项南，亦是先后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的干部，是胡耀邦的支持者。梁步庭在五十年代曾两次访苏。项南亦曾访问过苏联和日本，是所谓“国际派”。两人在文革中都是声沉名寂。打倒“四人邦”后，项南任“农业机械部”官

(秘书长)，预测最近的将来，将会出任中央要职。[①]

台北方面的资料指出：胡耀邦的左右手还有乔石(浙江定海人，一九二四年生，在中央办公厅(主掌机要及安全系统)；王昭华(一九二二年生)，在中央组织部；胡克实在社会科学院；吴学谦外交部。李立功派往山西。

香港的方剑云先生还点出李梦华(抓体育)，宋一平(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抓整风)，及目前驻外(大使)、副部长，省、市委书记约五十人。康富信先生指出，还有"教育委员会"(超部会组织)中的杨海波。还有"卫生部副部长"王伟及在地方上的省委书记邢崇智、张曙光(河北)、李瑞环(天津)、章泽(陕西)、汪家缪(北京市)。

经常在胡耀邦左右的有"纺织工业部长"郝建秀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这两个新人是所谓的"第

---

①另据方丹在香港时报"丹鹤楼随笔"指出，胡启立是"清华大学"的"团委书记"，被胡耀邦看中提拔到"团中央"，是中共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干部，胡启立，一九二九年生于陕西，"北京大学"毕业。外电称为中共第三号大权人物。

三梯队"的尖子人物。[1]

① 本节内容系作者根据推测和自己的理解撰写的，为了保持书的原貌，有些情节给于保留，读者可作进一步鉴别。

·编者·

确立领导地位和新路线

一九八O年九月十日，“人大”选举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取代了华国锋的一个重要职位。这时，当初曾对华国锋有过承诺的人实在沉不住气了。

此外，因“批毛”问题亦引起当年曾采“极左”路线的少数人的不满。

在北京，华国锋亦拒绝出席新年茶话会，当示抗议。

华国锋除了对内部作一份自我检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外，不愿再出现于公众场所。在居所，他亦退缩在二楼的起居室里。楼下大客厅的大电视机，他从不去看，让给护士去欣赏。

华的半隐居生活是否就使实行新政策的领导人放手不管了呢?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中央举行“六中全会”，胡耀邦就任党中央主席，同时将华国锋降为副主席。中共中央“十二大”，又降为中央委员。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五日香港明报的“读书报道”说:

一位在北京出版界任职的人说，最近，他们很

忙，正在突击完成一项重要任务。

什么重要任务呢？原来是一本一本地清理检查，各种杂志、书籍，以及图书等一切出版物。

查验什么呢？任何出版物中，凡是有“华主席”或“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之类字眼的。一律要更改或涂去。①

上海“文汇报”报头三个题字，原是华国锋写的，从八月十八日后，已在报上消失。该报首页报头仍是“文汇报”三个字，不过，是另一个人的手笔。

在北京的人说，他们在八月上旬，听了一项传达，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件，该文件要求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认真执行新的“审查准则”。

新的“审查准则”主要内容有二点——

①六中全会已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此，今天一切违反该决定精神的文章、作品等，不准发表。

②六中全会上，华国锋已降为副主席，因此，以前的出版物中，凡是有“华主席”、“华主席为首的党中

---

① 华在其当政期间，确实也有仿效前任领袖搞对其自身“个人崇拜”的事情，为其同事和为此吃尽苦头的国人所反对。

央”之类字眼的，都要认真改正。

同情华国锋的人说：华为“凡是派”，人人皆知。扳倒“四人帮”他居首功，也是人人皆知。虽然华能与叶剑英一齐定计，把“四人帮”抓掉，其功不可没。但华的历史注定了他是一个“凡是派”，无可奈何。试想，华是文化大革命造就的特殊产物，又是凭“你办事、我放心”六字“真言”起来的。要他否定“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于情于理都不合，因此，打倒“四人帮”后，按华的算盘最后是沿着毛的路线继续前进。但邓小平此人是中共有名的“智多星”（刘伯承称为“我的诸葛亮”），他要领导国家走一条真正繁荣富强的道路，对此华国锋当然是挡不住的。虽然其中也有反复，有曲折，但终因邓的资历、声望、智谋和斗争经验，加之所代表的历史趋向都远非华所能抗衡，故而节节退却。不过仅从华能捉“四人帮”这一点，也说明他并非庸碌之辈。大陆人对他品性，普遍的评价还是满高的。譬如，华的女儿文革期间就送到农村锻炼，儿子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高层干部的子女送到美国的已有几十个，而华不动声色。这正是他稳健的地方。

最后的消息是华被遣往党校接受再教育，华国锋

及“凡是派”逐渐离开领导岗位，为大陆改革开放的政策奠定了组织基础。确立了邓小平、胡耀邦的领导地位之后，一些新的或是一直被批判的政策才能得以实施并给十数亿人带来切身的好处。

胡耀邦的个性及作风

一九七六年前，胡耀邦的名字在大陆中国以外尚少有人知道。一位由海外回大陆的华侨商人说他曾见过胡耀邦。当时他的印象是：胡耀邦有时候非常谦虚有礼，但有时候却变得非常严厉。这位华侨还说，他绝猜不到胡耀邦会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党主席。

他描写胡耀邦：“个子矮小，步履敏捷，眼睛虽小但明亮有神，鼻梁挺直却略带鹰勾。”

另有人形容他是：“疏眉，牙齿不整齐，衣服宽大而不合身，稍带土气，唯一带有现代化气息的是他手腕上的电子手表。”

至于胡耀邦第一次向海外正式露面是在宋庆龄丧礼上，电视拍摄到他在现场指挥，好象在尽一个总干事的职责。他的表现与他的身份相比显得热情主动，这跟过去像他这样身居高位的人给大陆群众的印象是不一致的。

第二次公开在电视上露面，是在“六中全会”他被选为党主席后的《七·一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显得非常激动，声调过高而有些嘶哑。

当电视录像带在海外放映时，观众的反映是：“急

躁……欠缺雍容风度……不适合出任庙堂领袖……恐怕只适宜做幕后策划。”等等。大家对中国这一向保守之邦忽然出了这样一个活跃的领袖，即使是在西方生活的华人，也不是马上能适应。

胡耀邦长于理论及群众组织工作，早年接触的对象属于落后农村地区的农民，因而养成他演说时不自觉地习惯以夸张的口气及姿态出现。

一般认为，这种演说方式对青少年或农民可能有效，事关演说者本身的激情也有一定的传染性，大陆及海外的人们在逐渐习惯了他的讲演方式，特别是他以极大热情的讲演去推动实行的新政策在短时期内就为人们带来了好处之后，大家对胡耀邦的激昂也就欣然接受了。

对于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就敢于冒风险，敢于坚持，带着极大的热情去推广。中国领导人中，他对所从事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他的真诚与果断，都是极为突出的。[①] 对他个性方面的一些评论是：

---

① 胡一向以积极分子出现，一九五五年任“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主席团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主持“第二届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一九六O年六月任“全国文教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主席”。

"胡好学深思，办事细致。"

"讲话很随便，往往不经考虑冲口而出。富于情绪化，有时容易起冲突。"①

"在与人交往和处理复杂事物时，胡容易从己度人，常把事情简单化。"

胡耀邦十四岁就做"红小鬼"，大半辈子都为共产党做组织训练及理论工作，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四人帮"倒台后才进入中南海的中共中央政治权力圈，因而很可能欠缺主持大场面的磨练。

在现代知识方面，他有知识渊博的读书秘书，不断向他推荐和讲述古今中外的精华著述，尽管学历使他受到了限制，但长期的勤奋好学弥补了这一点。

在国际事务方面，胡耀邦就职总书记前唯一出国访问的经历，是二十多年前的一次访问苏联以及一九五三年七月率领"青年代表团"赴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参加二届"世界青年大会"，因而他对于西方世界在工技、人文及社会科学方面的日新月异，一直没有机会亲自去了解。对外交往的经验也有缺欠。（中共

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胡耀邦即发表谈话说，用筷子不卫生，容易得传染病，应该改用刀叉，引起了很多的议论。

在一九七九年在中南海开了一个“高干补习班”，所有领导人都参加科技知识的“补课”。但只办了一个极短的时间。）

有人认为，胡耀邦的优点是长于协调，他说话很随和，为人诚恳热情，对别人的痛苦有着极大的同情心。

也有人认为，胡的随和只是表面，实际上，他的“倔脾气”，即他的固执，给他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

与军队的关系

一九八五年四月九日，胡耀邦接见港澳记者，谈到激动时手舞足蹈，并从座位站起达五次之多。

另，胡耀邦的谈话亦几度被中共的官方发言人所否认。

一九八一年六月的中共"六中全会"，通过胡耀邦担任党主席。一九八三年中共举行了"十二大"，通过改变党章，废除主席，胡耀邦又变成总书记。

在这两年主席任内，胡耀邦的日子并不好过。

一九八一年春天，广东、福建和东北、北京出现过紧张的局面。改革遭到了一些人的抵制。他们还是抓住思想文化开刀。进入夏初，某家军队的报纸开始批评优家白桦，情况不利，不能再叫反"左毒"，掉转头来批判"自由化"，其中经过是相当曲折的。

原来早在六中全会前夕，邓、胡就有意调整包括少数军队干部在内的不合作分子。大陆的改革首先是从思想观点上入手的，邓、胡在头两年主要从事的是清理历史的工作，为历次运动中被打倒的人们平了反。这一做法开始时深得人心，待到为右派甚至更早时期被打倒的人平反时，建国后也少数一直"革"别人

"命"的人所不便接受了。四月十七日，某军队报纸发表社论，公开对白桦点名批判，接着《北京日报》及上海《解放日报》亦跟风严厉批评白桦，所例原因是白桦写了一部反映归国华侨在文革中受难的电影。但选中这一剧本作为批判"自由化"的靶子，似乎与传说的白同邓、胡有较多交往有关。因为据后来看过这部电影的人说，影片在政治上并无过分之处，艺术上也不成熟。

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向"反对派"作出猛烈攻击。

二十八日，北京贴出大字报，邀请白桦和某军报的编辑到北大辩论。北京青年一代的"女头面人物"冷眉带领一群人到撰文攻击白桦的黄×的家，砸碎玻璃，黄×要求派出所保护而被拒绝。民间一度传说邓派与反邓派双方剑拔弩张，摆出决战姿态，北京的政治气氛突然紧张。邓小平面对可能火爆的场面，决定改采"退一步进两步"及"软硬兼施，面缓里紧"的做法。

五月一日，"北京周报"发表他的谈话，重新赞扬毛泽东。

五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坚决整肃

那些破坏党纪的党员，对党内的、军内的强硬反“三中全会”路线的人作出强烈的警告。

六月十日，他借“人大第十九次常委会议”颁布“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

虽然如此，邓小平还是退让三分的。邓知道得很清楚，军队的稳定对改革的成败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所以他对军中的主要人事不作大幅度变化，他只有逐步提拔忠于“三中全会”路线的人，并且通过宣传和事实教育，请老干部们逐渐认清改革政策的好处和给各地区带来的变化，帮助执不赞成态度的人改变观点，争取老同志对新政策的支持。

一九八一年九月，原林彪的嫡系部队三十八军的王猛在受到数年冷落之后，出任广州军区政委的要职。

连邓小平都如此小心翼翼，困难重重，胡耀邦更是要谨慎从事了。

胡耀邦虽然在军中工作过，但因为胡耀邦自一九五二年起就专事在团及党搞组训及理论工作，与军方脱了节。

一九六八年香港“现代历史研究所”出版的研究中共军事的权威著作“中共军人志”曾编列了七百二十六

个中共军中人物的资料，其中就没包括胡耀邦。

又，自从毛泽东独掌权力后，中共一向是以党主席兼任军委主席的，但胡耀邦做党主席，却不兼任军委主席，而由邓小平自任。一般的说法，是邓还要给胡一段时间。只要改革新政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中国军队的广大指挥员和战士便会自觉地听从这位比较年轻的统帅的指挥。

又自一九八一年正式采取新的经济政策后，农村的生产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好转，解散了人民公社，土地分到了农民手中，广大的农民重新有了耕种的积极性并从中获得了比以前高数倍的报酬，一时间，中国的农村一片喜气洋洋。胡耀邦为了在全国推广承包经营制而四处奔走，说服不愿放权的领导和过惯了大锅饭日子因而不愿再去冒险的农民，中国大陆有八亿农民，新的经济改革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新领导人的威望也与日俱增，但难题开始出现。都市的物价已经波动。到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宣布将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闭幕的第二天，北京的银行出现挤兑，物价飞涨。十月二十五日的消息说：首先是北京、上海、天津的民众四出抢购物资，抢购的风潮迅速蔓延至二十多个省市。

严重的国民经济问题

"三中全会"后，中央宣布"形势大好"①，自从"人民公社"无形解体②，中共容许"包产到户"、"个体经济户"后，经济开放搞活，最得益的是有生产能力的农民，生活确实大有改善。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很多，胡耀邦在其中的功勋是突出而卓越的。但在城市

---

① 有关"形势大好"一词，曾在中共劳改营生活过的一位知识分子曾有如此的解释"'文革'开始之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被打倒了，'形势大好'；中共'九大'召开成立了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形势大好'；不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总司令'林彪又死了，'形势大好'；邓小平复出当上'第一副总理'，'形势大好'；'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又下台，'形势大好'；直到毛泽东死了，'形势'仍然是'大好'。所以自从施行了实事求是的路线后，这一长期使用的固定词语渐渐地被废弃了。

② "人民公社"的唯一好处，便是使共干更容易控制，但是由于生产全部归公，使农民不思出产，二十多年来所见，就看到其弊端数之不书，诸如政治会议太多，公社干部监督所有农产，政治及行政工作，使权力过于集中，而犯错误时，受影响的家庭数以千计。同时浪费人力物力的情形至为普遍。

在大陆农村现在所实行的"责任制"就是由一个家庭或几个家庭合成了一个生产单位，定下一个生产额，由他们自行决定如何达到生产目标。恢复乡镇，在管理上确大有改进。但据刚实行这一政策时中共报章透露，许多干部阻挠这种改革，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这样会结束社会主义的农业，虽然土地，大型装备以及农村工业仍是集体所有，而且生产也是基于合作的基础。他们所担心的，实际上是他们的"饭碗"及他们的权力。有的消极反对，索性不理他们的工作；有的则关闭公家经营的企业，引起损失。

中，如何进行改革，这是中共面前棘手而又迫切的难题，解决不好，会使改革新政夭折。邓、胡在农村的改革进行了五年之后，迟迟未能拿定城市改革的主意，因为其间难度确实太大。历史的因素和现实的困难使改革进行到这里便举步艰辛，苦乐参半。因为出现部分自由市场的影响，通货迅速膨胀，物价高升，购买力反而相对下降。对一般老百姓来说，物资的缺乏还是普遍严重，下面是一篇香港所见的报导：

“现在不管实行什么新政策，也改变不了我们的实际生活。一位上海朋友灰心地说：你看自由市场吧，本来以为有了自由市场，大家小菜能吃得好一点了，可是结果只见物价涨，不见东西多，饭桌上的小菜还是少得可怜。”

“原来，上海郊区地少人多，自留地数量有限，生产出来的、可供自由市场的产品自然也有限。有些人为了利用自由市场发财，虽然自己没有自产的商品，就想方设法从别处购进，来倒买倒卖。现在最流行的做法是从国营商店‘走后门’买出来官价商品，再投入自由市场议价出售。结果，国营商店买不到东西，自由市场物价飞涨，老百姓怎么会不怨声载道呢？

一九八一年夏天，上海的蔬菜非常难买，每天都要清早四、五点钟去菜场排队，才能买到一点点。据说最早的时候每天才上市三万担，平均每个市民不到半斤。饭店、机关食堂抢购一批之后，居民简直买不到什么菜了。”(其他情况参考八五年元月八日中国时报)

广州、深圳作为城市改革的先行者，拥有良好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政策，新政给这样的地区注入了活力，但为了使更多的人在观念上有个转变的过程，这种试行新经济体制因而获得诸多好处的区域尚被称为“特区”。大多内地城市受农村经济的包围，又无特准允许施行的对策，情况多少近于上海。中国大陆首富之地上海市的老百姓的生活尚产生如此动荡，其他地区可想而知。

令人震惊的是，天灾接连而至，未尝停止。一九八一年夏，华北出现百年来罕见的大旱。山西省的二千四百六十万人口中，有一百万人在灾区挣扎，失耕地达五百万亩，占可耕地面积百分之十。甘肃及安徽两省，亦遭干热风的侵袭，旱灾蔓延及十五省市“自治区”，超过中共二十九个“行政区”二分一。湖南一地，出动抗旱的劳力即高达四百四十万人。

但似乎在同时，前所罕见的洪水又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其他省份。

一九八一年七月，汉中及四川由于暴雨，长江沿岸遭受三十二年来最严重的水灾。仅四川一省，洪灾波及一百三十五个县、市，一千一百八十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有三十五个县以上的城市，五百八十个乡镇、二千六百多个工厂企业和一千二百多万亩农作物受淹，房屋倒塌一百六十万间，人畜伤亡较大，直接经济损失达二十亿元“人民币”。无家可归的难民超过一百万，流行性疫病出现。八月，陕西的暴雨持续了二十多天，三十三个县、市受害，灾民达一百三十二万人，灾区发生大规模的劫掠。九月，甘肃又发大水，洪峰沿黄河直下，危及多处水坝及下游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中外震动。

据估计，数目众多的灾民无法在短时期内重整家园，很可能群相涌往都市求生，使都市中本来已经日臻严重的房屋缺乏问题变得更严重。一位曾游四川的侨胞说：“重庆街道上在夜间都挤满人，但因电力缺乏，在黑暗中只看到人头在无声中移动。”

在医药卫生方面，水准仍落后，人口仍得不到很好的控制。

有些流行性疾病与天灾无关，却也在大陆普遍出现，如根据路透社的消息：一九八一年疟疾增加了。福建、广东两省均出现狂犬症。

美国记者芬克思在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脑炎与脑膜炎在中国大陆猖獗的程度，“即使不是最高，也是最高者之一”。①

霍乱应有三次的记录，一九八一年九月，发生在中山县，整条乡被封锁起来。

另根据中共新华社六月十六日报导，中国大陆接近有七百万人患上肺病。在国民经济出现问题，改革因情况复杂出现困难时，另一种疾病也随之突发，中国一向为人民服务的党，产生了相当普遍的党风不正的问题。这其中包括利用手中权力索贿的现象。经由运用影响力而为亲友子女所开办公司谋利互惠，当干部可以为亲友安排自分发工作至出国旅行等一切事务，类似的不正之风曾屡禁而不止。

为某人的亲友而运用影响力的情事早属司空见

---

① 英文“中国日报”和中文“中国新闻社”说，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郭子恒在新闻简报中透露了此事。

“中国日报”说：“中国的主要地方性疾病危害四亿二千万人，在三百余城市中有两百八十八市，二千四百县中有一千九百二十县都受威胁。”

惯，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日本“现代月刊”三月号刊载中国问题专家高木桂藏的“中国特权阶级的真相”的文章。这是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文章。

中共外销海外数量甚多的“五羊牌水泥”，其中输出总额百分之十五的利益均为某高级领导的次子所得。

另有某高级领导的女婿也曾利用泰山的地位为掩护，进行买卖黑市美金的交易。他并曾向某省主要输出品矿泉水收取佣金，去年在广州交易会中，据传他便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高木桂藏指出，目前大陆在海外的两万留学生中，百分之二十五为干部子女，百分之二为中共驻外外交人员的子女。①。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一九八一年七月发出通知，要求杜绝歪风，并特别指出，大陆普遍存在“关系户”，是行贿与受贿之处，没有“拉关系”，就受

① 一九八五年七月，在日本从事间谍活动，因事潜逃返苏俄的国家保安委员会(KGB)人员布拉金斯基证实，他潜伏在日本三年来，主要目的在吸收中共留日学生中的高干子弟，使这些人回大陆后，能为苏俄所用。

到刁难，事情办不成。但由于少数高干本身就在忙着搞关系学，替自己个人利益打算，中央提出的“杜绝歪风”口号无法在根本上得以实现。在这方面，最能严于律已而为国人所称道的，胡耀邦是较为公认的一个了。他的清政廉洁使得他有了敢于直面不正之风进行竭力斗争的权力，也使他赢得了当代“新包公”的美誉。

三十年来，中共一直在没法建立的一套共产主义社会人生价值观，就是当权中的某些头头不能以“身教”代替“言教”。

当中共中央训令人民要遵行集体主义，牺牲个人短期利益谋求国家长期福利之时，当权的某些高干却在大过奢侈生活，包括建行宫、大吃大喝，及浪费公款。

这就难怪大陆人民中有一种失望和不满的情绪。邓小平和胡耀邦都为此深感忧滤，指出这关系党的政权存亡的大事。

九月份出版的“北京周报”承认:“投机倒把、亏空公款、打劫行骗、谋杀以及其他罪案已告增加，有一部份年青人毫无志向，只沉于寻乐。”香港的一位大陆问题研究者说，中国大陆在六十年代是“人斗人”，七

十年代是“人怕人”、八十年代是“各人顾各人”。他说:

“人斗人”、“人害人”的结果是使到人人自危。不要说是社会上的人就是连家庭中的成员，包括父子、兄弟、夫妻等等都变成互不信任。亲情、人伦、人性、都受到“阶级斗争”的冲击，于是，发展到了七十年代，人与人的关系变成是“人怕人”、“人防人”。开会时固然要“站稳立场车大炮”，在亲友面前也要仔细衡量，即使最信赖的知己，甚至夫妇，都不能不互相防范，怕一旦说漏嘴了，招来横祸。人人在自己的四周筑起围墙，大多数人不得不为了保护自己而说假话。

“人怕人”的哲学基础是：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信赖的，因此在疯狂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时代，自私自利的观念反而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泛滥，许多人在心中根本不相信有不利己也利人的人，甚至不相信有公心。

长期以来的“人斗人”、“人害人”“人怕人”、“人防人”，使人与人之间已缺少了互相信任。在许多人的意识中，只有自己才是最可信任的，当然是只顾自己了

长期以来的贫穷落后，带来不断增加的个人的前途和出路问题。大批人变相失业，在政府不能为许许多多人解决个人问题的情形下，人们就不能不自己顾自己了。

严重的天灾和民心不定，就是胡耀邦做上党主席后，所面临的两个棘手问题。可以想见，以他瘦小的身躯，将要挑起的是怎样一副沉重的担子！大陆中国太大了，要解决的问题又那样多，问题之间又相互关联，这是个使人累到白头也难理清头绪的国家呀，多少人爱她，可又对她无能为力。共产党的新代领导人，能够为她做的一切，都已经是不容易，他仍要背着前三十年错误历史的包袱，去重新赢得老百姓的信任，这可真是一次新的长征。

人心热不起来?

当大陆中国的改革还是在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的时候，群众仍旧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其中的。

当改革使亿万人看到了它的丰硕成果时，中国的人民是以前所未有的冒险精神勇敢地创造性地执行着中共中央的改革的。农村改革的成功使领导者有了信心和威信，但当这改革进一步深入，当它必须借助某种更根本的改变才能继续得以前进之时，它所出现的反复又使老百姓困惑。

在这段期间，知识分子如名作家王若望等提了很多坦率意见，如他在“花城”杂志写道：

“说假话也就是说谎的同义语，一个人喜欢说谎，他的人格就值得怀疑，且不谈能不能作为共产党员了。说假话成为一种风气的话，那实在是非常危险，非常糟糕的情况，上下交相欺瞒，拍马吹牛者升官重用，报刊报喜不报忧，假话连篇；工作报告则千篇一律；‘好’字当头，缺点错误永远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尔虞我诈，谁也信不过谁；统计报表弄虚作假，多加一个零也无人查纠，人们早把老老实实扔在九天云外了，于是形成了：‘出门说空话，开会说

大话，逢人说假话，夫妻说悄悄话’的格局。”

同时，为了要彻底打倒“四人帮”及纠正“两个凡是”，包括邓小平、胡耀邦等坚持审判“林、江集团”，在审判的同时（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发动舆论大量公开讨论毛泽东的错误，三十五名“审判员”之一的人类学家费孝通说：“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大陆像一艘船，由于领航员犯了错误，驶进怒海之中。”在高层也领头抨击毛泽东“一言堂”的情况之下，民间更是兴致勃勃。

多年来一向在毛泽东及其党中央的威慑下胆战心惊的老百姓，经过了这一次的“评毛”，可说是大开了眼界，人民觉悟了，点点滴滴街头巷尾的讨论，甚至党员私下对时势的意见更无法象从前一样的“上下对口，一竿到底”，要求民主，要求知晓和参与决策的倾向越来越浓了。但这也带来了相反的某种结果，那就是人们信仰的危机和讲求实惠的庸碌心态。

利用有亲人在美国申请到美国自费留学的知青张通树（译音）向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说：

“我是受毛式教育长大的，毛泽东曾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是我们‘伟大的舵手’，在我们年轻时，我们完全相信这一套，因为我们不知道世上还有别的

信仰。但是当我们终于开始了解毛泽东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个样子，而是利用中国大陆青年以便在权力斗争中达成他自己目标的谋略家时，我们的梦想已被彻底摧毁，我们变得一无所有，除了物质主义外，再没有任何信仰的目标，但是在一个无法生产出足够物质的地方，要信仰物质主义却真不知从何说起。”

中共中央为评毛所定的基调是“建国有功、治国有过、文革有罪”，但民间对毛的看法却众说不一，有些人把中国近百年来的落后全归到了毛的身上。党居然成了少数人发泄怨气的对象。

十一月的《南方日报》承认，有些民兵认为香港“好捞”，有些民兵“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同月，瑞士巴塞尔日报驻北京记者汉兹鲍勒报道，根据在上海对五百名学生进行的一次调查，有百分之四十的学生承认他们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北京市党委某领导人承认，越来越多的人有自由思想，“影响非常恶劣”。

最后，连“邓小平文选”中也不得不承认，有人认为“共产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大陆不如台湾”。次年民主化的要求越来越炽热，元月间，河南开封市有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高呼“我们要人权，我们要自由民

主。”其中也不乏个别糊涂，乱提口号，不问黑白只顾一路骂过去，授反改革之人以柄的。

终于，在四月，出现指名抨击白桦及公安部门的逮捕地下刊物人士，开始为“收”风开路。

起初，还是采取缓进的方法。

五月，罗汝佳先生在香港报道:“不久前在内地重看旧片《云雾山中》，有一个场面，一群解放军战士奋起请缨剿匪，一个站出来说:‘我是共产党员!’接着一个个站起来:‘我是共青团员!’‘我是干部!’看到这一个个争着为国为民献身的镜头时，许多观众（特别是青少年）哗然大笑，这使人回想起‘文革’前初看此片时，每到这个场面，全场肃静，观众都被这镜头所感动，何以事隔十余年，竟有如此截然相反的效果?这证明了并不是文艺家、而是中共在‘文革’十年中自己严重地丑化了自己，造成了信任危机。”

到了六月，看到情况极端不利，再放任下去怕发展成象波兰那样的局面，中共中央决策层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冲突。为了避免形势发展下去难于控制，邓小平和胡耀邦还是首选了稳妥保守的收的方针，这看上去是对他们反对派的一次妥协。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妥协给他们带来了六中全会的胜利。

八月初，邓、胡两人正式亲自出面发起清理思想运动，召开“全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对于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脱离共产党领导，以及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主义的倾向，加以认真正确的抨击及对抗。”

会议由沪共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主持，于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召开，有陆海空军负责人和各级组织领导干部共六百八十五人参加，会议指出：“当前亟需引起注意的问题是，思想战线有一股思潮，有一种倾向，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严重问题，香港的共产党报纸负责人全部出席，气氛极为紧张，使另一个为了统战而同时召开的“辛亥革命讨论会”为之黯然无光，只得草草收场了事。

九月间，中共派出两千六百多名“团以上干部”，带领工作组，“深入基层部队”，宣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随即也警告外国通讯社记者，不得再发表有关中国民运分子的写作和活动。法新社报道说：

“负责新闻司的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人权和民主活动积极分子的报刊都是不合法的。

一九八一年间，一位曾游大陆的作家杜烽在香港一份左派杂志上就“人心为什么热不起来”这个主题报道说：

“‘北京人的心热不起来。’这是我到北京后，朋友对我讲的第一句话。”

“这次到北京，正是中共六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四年之前，我也曾去过北京，当时正值‘四人帮’垮台，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年初见效，三年大见成效’的宏伟计划之时，只记得那时北京人是意气风发，虽然那个计划是不合实际的产物，但人们仍然抱着善良的愿望和诚挚的热情，希望能为祖国的‘四化’贡献力量。”

“到北京之前，虽然听说过北京人的热情是不比当年了，但最近闭幕的六中全会，不是向人民发出了攀登泰山的号召，提出了非常美好的奋斗目标吗？

但想不到，朋友却用这样丧气的话迎接我。

‘为什么大家的心热不起来呢？’我问。

‘因为我们的热情被失望浇灭的次数太多了’朋友说。

‘文革’只不过十年，四人帮垮台到现在也快五年了。这五年来的反复变化，的确使很多人由希望变为

失望，人们最大的失望，是对领导层失去了信任和信心。

‘因为第一，他们不肯实事求是讲真话。’朋友说，‘别的不讲，就说这次学习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吧，上面规定大家学习讨论时要宜粗不宜细，据说这样才能抓住主流，才是符合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其实老百姓谁不明白，所谓不宜细就是要大家回避很多历史错误嘛！这种学习还有什么意思？难怪一到学习讨论，大家不是闲聊天，就是发牢骚，最近又在提倡什么思想政治工作了，所以各单位的学习时间也延长了，不过按这种学习方法来学习，完全是瞎耽误功夫！’

朋友又说，使人们失望的第二个原因，是上面政策变化反复太大，而且有说话不算话的现象。”

如一份香港出版的左倾刊物在八一年五月间已报道说：“这次‘收’风的风锋，不仅触及了年轻人的文章，连中共高干的某些言论文章，也被刮了一下。

‘最有意思的是宣传部长，’有人说，‘这位部长写了一篇论述民主的文章，写好后送到了社会科学院。但是，他忽然从上面听说了收的动向，又得知自己的文章可能挨批，于是匆匆忙忙坐公共汽车来到社会科

学院，想把稿子要回去，但负责人不还给他，最后，他的文章还是挨了批。'

这位宣传部长并非唯一挨批的高干，那位批准出版'青年文稿'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更是首当其冲。"

九月中，人民日报人事也有变动。

全力进行"反自由化"战役的效果又如何呢?

明显的例子是"一九八二年美国移民归化局"公布，自一九八一年十月至一九八二年三月，有七百五十一名中共留学生要求留居美国。

妥协使得半明确的改革目的变得含混了。经过"文革"的中国人，愿意用自己的头脑去想问题，明是非，可怕的是当大家在邓、胡的带领下，看清了该往哪里走能有好生活或者说是晓得了人该过怎样的生活的时候，偏偏为了几个想不明白又掌握实权的人，大家又都要被迫停下来等待，等待那些终于想明白或是终于成熟的时机。人民的利益到了八十年代还要受到高层权力斗争的损害，身为党主席而又始终无私的胡耀邦的心境，是可想而知的。

举步艰辛

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修改了党章，废除主席制，胡耀邦被复任为总书记。

这年，胡耀邦是七十整岁。

改任总书记后，一年中，胡耀邦访问了日本、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在大陆境内，他也奔波不停。深圳[①]、福建及在动乱不停的海南岛和新疆，他都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针对各地不同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同时争取在了解总体情况的基础上，把握改革的全盘。所到之处，欢声笑语，百姓对他是深感感激之情的。

但在五月间，他访问南斯拉夫时发表演说，其中一句"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教条"，日后造成他"政敌"引以为攻击的借口。

十月间，形势再次紧收。他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批评。批评来自内部，事后海外报道形容为"中南海里的一场小政变"。经过情形经香港左派杂志

① 深圳是临近香港边界的一个工业区，中共为了替"四化建设"制造一个样板，集中资金及调用了数以万计的建设人员在该区内大兴土木。

的报道是这样的：

‘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讲话（陈云也在会上讲了话，但着重谈清除三种人）之后，当时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某人，活跃非常，一个劲地要宣传部门大造“除污”舆论。他乘着中共中央在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传达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机会，打响“除污”的连天炮火。世先是请一位领导在会上大谈清除精神污染问题，然后他亲自出马，“揭露”了理论思想界、文艺界精神污染的“现象”。与此同时，他要求另一位高级官员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党校教学座谈会（十月二十三日）讲话时着重反“右”反“污”。他还利用了中宣部的地位，串联《红旗》杂志某总编辑、某副部长等，组织和发表大量文章、谈话，他自己的文章也多次上报。一时间，“除污”“反右”的声音喧嚷北京，喧嚷全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位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同志为什么那么起劲地大搞“除污”运动呢？

一位知情的高干对我说，他是借“除污”以反胡。

这位是怎样一个人？他今年七十岁，湖南人，一

九三六年入党。一九四六年前在北平、东北搞宣传、组织工作。一九四九年后担任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长、刘少奇秘书，《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国务院政研室主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长。他原属改革派，是邓小平“智囊团”中的要角之一，对打击凡是派出过力。

就在十二大前后，这位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同志与胡耀邦之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十二大前夕，邓小平出于爱护接班人的动机，对胡耀邦、赵紫阳提出意见。这个批评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的，而且没有恶意。但是，在十二大之后，这个消息传出去了。这当然不利于胡、赵的。甚至有人见风就是雨，说什么胡耀邦的地位不稳了。

是谁把消息传出去呢？

这个“泄密者”终于被查出，受到了应有的批评。

在一个不太短的期间，他坐了冷板凳，近乎销声匿迹。

十二大前后，胡耀邦和赵紫阳一意推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接受了来自保守方面的反对意见的挑战。由于党风不正，民风也就不好，加上

外来的坏影响。反对胡、赵的人，就抓住这条辫子，打击胡、赵，攻击开放政策。

与此同时，理论界、文艺界比较活跃，文艺创作有了生机，《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了一些有关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作了谈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篇报告，熊映梧在上海杂志《社会科学》发表了评论资本论不足之处的论文……这本是“百花齐放、百家齐争”方针应当允许出现的现象，但是许多刻划人性的文学作品和学术探讨的文章，都被那位负责中央宣传的人视作毒品。在他主持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他组织了批评。在北京，许多知识分子都知道，周扬是胡耀邦的好朋友。

在那位负责中央宣传的人等看来，文艺园地、理论圈子的开放，是和胡耀邦的比较开明的态度分不开的。而这个开放和开明，又是胡耀邦在群众中树立威信的基础。

八三年六月四日，那位负责中央宣传的人在中央党校作了一个长篇讲话，这实际上是总攻击的一发信号弹。

他说过:“精神污染”四个字是邓小平同志首先提

出来的。其实，早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之前四个月，就是他在中央党校那篇讲话中，已经出现“精神污染”四个字了。他在讲话中抨击了文艺界、理论界的勇于探索的人和他们的实践。他说：

“在思想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有极少数人，其中也包括个别的共产党员，打着‘思想彻底解放’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有的人从西方猎‘奇’，但猎取的却是早被马克思主义批判过的、已经腐臭了的东西。他们把这些东西贴上‘新思想’的标签，让这些东西在人们中间散发着腐臭气息，污染和毒害人们的心灵，扰乱人们的思想，妨害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关于所谓‘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异化’的错误文章和宣传，已经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在一部分青年学生中，消极影响是很大的。我们所有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都有责任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认真分析各种错误思潮，努力清除精神污染，使我们的青年和其他社会成员逐步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这是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提出“精神污染”四个字的言论。

他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实际上是中央党校搞“除污”的动员报告，是“除污”试点。不用说，其后就把情况向邓小平汇报了。

这是他向胡耀邦展开总攻击的一场演习和序幕战。也是邓小平在二中全会着重讲“除污”问题的一个背景。

“除污”行动由邓小平号令展开之后，这位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人就大搞运动了。

不过，他的如意算盘没有打响。

胡耀邦是知道他在搞什么鬼。他的第一次表态是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对“除污”问题谈得不多，只是寥寥数语。其后，就极少就此公开发表言论。

经常反映胡耀邦态度的《人民日报》，顶住他的指挥棒，对“除污”表示冷淡。这表现在发表关于“除污”讲话的第八天，《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才第一次沾上“除污”的边。

由于“除污”运动不受欢迎，在文艺界中反应之强烈，特别突出。而影响所及，对政治上的稳定局面，经济上的开放活跃、军队中的安定团结，都造成冲

击。许多人在恐怖的气氛中猜想：一场新的“文革”就要到来了。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和倔犟的个性，胡耀邦开始反击了。

据说，在“除污”运动搞了不足一个月的时候，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就联名写信给邓小平，对大搞“除污”——“除污”过头（官方语言是“清除精神污染的扩大化”）提出意见。这是胡耀邦的第一个反击行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书记处、各报编辑部和其他有关部门，接到了无数群众来信和许多政协委员、中共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一些党、团基层单位的意见书。这些来信的小部分，坚决反对搞“除污”运动；大部分一方面表示赞成批评某些“精神污染”的现象，一方面对当前种种做法表示不安，或提出质问，甚至表示抵制。此外，文艺界理论界一般人士对“除污”运动都以沉默表示抗议。

就在党内外、党上下、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八三年十一月中旬开了一个紧急扩大会议，讨论“清除精神污染”问题。

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会上讲了话。这是胡、赵的第二次反击。

胡、赵讲话的一个主要精神是强调整党与建设，反对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扩大化。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发了一份文件：《清除精神污染工作扩大化的调查报告》。文件列举了很多例子。

——不少地区、单位的领导指责妇女烫发是精神污染，并强行命令留发不得过肩，裤脚不得窄于七～八寸，不得涂脂抹粉，不准带耳环。

——在一些农村里，个体经营户被消除，承包合同被撕毁，长途贩运的农民被扣留，万元户在银行的存款被冻结，四川曾发生先富起来的农民，因银行冻结存款，不能支付执行自己承包合同的款项而自杀的事件。

——一些部队强迫战士交出国内印行的文艺书刊，交出“会造成精神污染”的未婚妻照片等等，以致严重影响军心。

——批评因各种困难向上级申请经济补助的战士和干部。

——禁止农民出身的部队干部在城市找对象。

——规定战士和干部只准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当然，有一

些怪现象并没有列入文件之中。

——在东北和四川，有的地方发生了成群结队的人上街剪长头发、砍高跟鞋、撕破衣服、登记录音机的事情。

——在由日本、美国投资中国的企业界中也引起了恐慌，几百个日中合作的合同一度准备停止执行。

书记处的文件有力地说明，如果“除污”运动不及时收缩，后果将非常严重。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的评论员文章（十一月十七日），指责把美化和充实生活（包括烫发、穿漂亮衣服、跳健康的舞）看作是精神污染的错误做法。这篇文章反映了胡耀邦这位共青团老书记的观点，由中央书记处责成中宣部通知全国报纸，包括《人民日报》迅速转载。

又是讲话，又是文件，又是评论文章，三箭齐发，射向“除污”扩大化的行动，也是对那位当时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人的一次有力反击。

一位相当了解中央书记处的朋友对我说：前一阵子，那位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人大搞“除污”舆论，是绕过书记处而独断独行的。不久，在书记处的一次会

议上，他受到了批评。这情况，在薄一波（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启立（整党工作指委会副主任）、宋任穷（整党工作指委会顾问）十一月二十六日向整党工作第一批联络员所作的讲话中也有所透露。他们说：

“中央书记处注意了这个问题（指‘除污’扩大化——作者），向有关部门打了招呼，一定要准确地实事求是进行宣传，这就是最近《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系列阐明政策界限的文章，以及《中国青年报》社论《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的由来。”

这段话说明书记处要求“有关部门”，一定要准确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宣传”，实际上就是说书记处认为中宣部过去搞的“除污”宣传，既不准确，也不实事求是。

至此，胡耀邦、赵紫阳对那位当时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人的反击可以说是初战告捷了。

对于胡耀邦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一九八三年）是他到日本访问的日子。如果在出国前不把乱搞“除污的势头和那位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人的气焰煞住，谁也不能保证这八天里不会出乱子的。

北京就有人把从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旬搞的"除污"反胡讲为一场"小政变"，由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和其他头脑清醒的书记处书记的努力，由于党内外广大人士特别是文艺界、理论界一般人士对乱搞"除污"运动的抵制，这场"迷你政变"被压下去了。

不过，胡耀邦并没有就此自我解除精神武装。他是在中央书记处作了一定的部署才出国的。传说在他访日期间，习仲勋、赵紫阳、万里曾访晤邓小平就进一步制止"除污"扩大化提出意见。

结果，那位当时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人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和全国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带点自我批评味道的讲话。他说：

"新闻、报刊、广播、电视等宣传部门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宣传报道，要在思想战线这个范围内做文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我们的文化生活要丰富多采，不能一讲清除精神污染就把我们的节目搞得那么单调、那么冷清。

"为了顺利地进行四化建设，我们实行搞活经济的方针和政策，不能把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中不成功甚至失败的东西说成是精神污染。

“不能把基本倾向好但有某些缺点、毛病的作品都说成是精神污染……学术问题还是要正常地进行讨论。

“我们希望人民的生活丰富多采，生动活泼，决不能因为清除精神污染，使人民生活变得单调起来。清除精神污染正是为了更好地美化人民的生活。”

这个讲话，等于承认了他的反胡计划失败了。

一两个月前北京各处所停止举行的舞会，在新年全部重新开放。“舞照跳”“花照栽”，“鱼照钓”。

销量特大的《大众电影》杂志，八四年一月号封底全版选登了因为《我的路》而受非议的刘晓庆大幅彩照，藉以显示刘晓庆“别来无恙”。

周扬应邀写的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文章，只是蜻蜓点水地把“精神污染”四个字提一下，就能过关，发表在党报上。

这一切显示出，胡耀邦的纠偏成功了，作家们、理论家们对“除污”运动的抗拒，迫着搞运动的人作了一点让步了……。”

胡耀邦在小政变”事件中虽然化险为夷，但据说这次事件暴露出一个问题。这个在北京引起广泛议论的问题就是：那位负责宣传的同志，怎么就能在不得

人心的情况下掀起如此的风浪?

同情胡耀邦的人说:"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看法，陈云和胡、赵在经济改革问题上也有一点歧见，这是正常现象。而胡耀邦遇到意见相左的情况时，往往放弃己见，听邓的话，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不过这些改革派内部的非组织性分歧，都给那个负责宣传工作的人利用了。"

此说反映出胡耀邦当时的处境是相当复杂微妙的。

另外，在大学校园中，这一年里，头痛事件亦层出不穷。

五月间，根据穗共"羊城晚报"二十三日消息，湘共领导层，在"湖南大学"各级干部中，进行了为时一个多月的清理极左思想工作，结果是"空对空"，并未收到任何效果。

消息中说:"直到目前，过去执行'左'倾错误路线而至今还被'左'的思想禁锢的原学校负责人，包括学校新领导班子的个别成员和一些系处级干部，不仅不投身到清理'左'的思想影响的工作中来，甚至还制造奇谈怪论，设置重重障碍，研究室有的领导人，不但不进行自我批评，竟盛气凌人进行反批评，使极左思

想没有得到清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未落实。”

有份文件陈述：去年京、津、沪三大都市和吉林、辽宁、四川、陕西、湖北五省学潮事故，其中十六件是学校伙食所引起，学生对币值下降食物涨价、服务态度不好，不讲卫生，纷纷在校园掀起抗议活动。另外的二十次，多因不满中共政策及干部作为所引发。

学生的反抗活动以张贴大字报、小字报、罢课、罢餐、游行、请愿等行动强烈表达了他们不满的情趣①。

但令人难堪的，还有接连发生两个案件。

这些案件都是轰动中外的大新闻，使七十岁的总书记胡耀邦坐立不安。

---

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美联社电讯报导：“北京大学”学生消息人士星期日说，大约五千名“北大”学生上周在“校长”办公室外面非法集会，抗议宿舍寒冷，以及校方最近规定要他们在晚上十一时熄灯。

那些消息人士说，学生在十二月十日晚上举行集会后，有一晚有些学生将燃烧着的报纸抛出宿舍窗口，并击碎几扇玻璃窗。

消息人士说，集会为时很短，无人被捕，也无人受伤，学校大门的保安已经加强，前往外国学生宿舍的通道，保安尤其严密。

示威学生说，新的关灯规定减少他们宝贵的温习时间，许多学生的课要到晚上十点，此外，宿舍暖气不足，也是学生不满的另一原因。校方实施新的关灯时间是要节省电力和保护学生健康。

中国的面前只有一条路，但这路走起来却总好象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分割延伸无法求全。处身于这一时代的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将都是属于悲剧性的人物，成事者悲壮，败事者悲凉。好在他们在投身革命之时，就已是把个人功名置于脑后的。

结 语

从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城市经济制度改革，部分接受市场理论，及开放沿海若干港口及海南岛特区，可以看出中国是在变。它逐渐变得实事求是，拥有活力，能加入世界潮流，并在经济上开始起飞了。如果不再遭遇到“第二次文革”或某种形式的变故，是可能会持续下去。

某些势力仍坚持改革路线应限于经济，而不应扩充到政治思想的领域。可见，阻力也是很大的。

今日的胡耀邦本人还无法掌握住整个局面。而且，不但胡耀邦办不到，连邓小平也办不到。这许是件好事，是邓小平和胡耀邦所希望的。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人口，这么复杂的局面，凭某人的一句话就能定了乾坤，未必就是件好事。

胡耀邦当前的苦处就是要三方面作战：

一方面要防“四人帮”残余分子再起，忙于反“左毒”；另一方面却又一直在与正脱离社会主义路线的自由化思想蔓延情况作殊死战；第三方面，要留意“第三势力”。他知道，如果这场三面作战的仗打输了，后果必不堪设想。

这已够他疲劳的了。十二月间的“人民日报”评论被攻击事件发生后，这个七十一的岁的总书记颇有所感，他首次（于十九日）向外宾表示，一九八七年“党大会以”后他将慢慢地隐退。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胡耀邦传
SS号=11803052
URL=http://image2.5read.com/im
age/ss2jpg.dll?did=b24&pid=99C
34844E47ADB15BD72BD9CF45FA76A0
0EF7B44F44329D68F97CAA09F1F6D4
0519E713204658D719468118097622
FD4BF67478E8C7B58CD31A438C609A
5A0D44A3681EDB3086A257E8E211DA
D625324EF274829CC94EA18454563A
C&zoom=2&jid=/000001.jpg
dxNumber=000004860346
d=FF3846D64E70E3292D2ED47DEEFB
47A2
页数=107